



宋代士大夫 群体意识研究

A Study on Scholar-Bureaucrats'
Group Consciousness in Song Dynasty

郭学信 著

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士大夫 群体意识研究

A Study on Scholar-Bureaucrats'
Group Consciousness in Song Dynasty

郭学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 郭学信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774 - 0

I. ①宋… II. ①郭…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47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44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缘起	(1)
二 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学术回顾	(6)
三 研究思路与主体内容概述	(28)
第一章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	(32)
一 唐宋变革观的回顾与审视	(32)
二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化	(48)
第二章 唐宋转型中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	(52)
一 教育平民化与宋代士人群体的崛起与壮大	(52)
二 “以儒立国”与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	(61)
第三章 宋代士大夫角色意识及观念转变	(86)
一 “仕以行道”的入仕参政观	(86)
二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观	(95)
三 亦政亦文亦学术的角色认知	(106)
第四章 贵族政治式微与士大夫群体凝聚意识	(113)
一 宋代士大夫群体凝聚意识形成的根源	(113)
二 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自任以天下为重	(116)
三 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	(130)
四 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学派纷出	(140)
第五章 雅俗贯通与士大夫世俗意识	(161)
一 雅俗贯通的文化人格	(161)

2 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 二 耽恋歌儿舞女之声伎之乐 (169)
- 三 人心趋利之拜金主义 (176)
- 四 生活侈靡,宴饮成风 (180)
- 五 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之文化解读 (186)

第六章 职业屏障打破与士商关系融通 (202)

- 一 传统贱商观念与士商情感疏隔 (202)
- 二 士对商社会功能与地位的重新审视 (206)
- 三 士商兼营或弃儒从商 (211)
- 四 商向士人阶层靠拢 (216)
- 五 宋代士商关系融通之文化诠释 (222)

第七章 “心安处是吾乡”的隐逸意识 (235)

- 一 心怀山林,钟情于山林之乐 (235)
- 二 坐拥园林,寓隐于仕 (240)
- 三 身居朝堂,渴望挂冠归隐 (245)
- 四 参禅学佛,仿效隐士 (252)
- 五 宋代士大夫隐逸意识盛行的历史文化语境 (259)
- 六 余论 (281)

结语 (285)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309)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作为士人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虽然自官僚政治产生之日起业已出现，但其内涵和担当的社会角色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同样，由于不同时代士人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以及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士大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也是有所不同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庞大的士人阶层形成于殷周时代。在殷代，不仅有指称左右相的“卿士”，还有居于贵族低层为数众多的“多士”^①。西周时期，周王朝不仅有国家的“济济多士”“皇多士”，而且士以上各阶层有各阶层从属的供职之士。随着殷周时代士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士”所指称的范围也日趋复杂并发生分化。从士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看，士大致经历了从低级贵族、武士到文士的演变过程。大致说来，春秋之前，士是贵族中的一个等级^②，其社会角色基本上以武士为业；自春秋战国开始，士则从一个等级概念转化为一个社会阶层，其社会角色逐渐由武士转为文士。对此，阎步克先生总结指出：士的基本含义是成年男子，“士”又应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有资格入仕为官担当职事；“士”又可通假为

① 《尚书·多士》中，周公称殷贵族遗民为“尔殷遗多士”。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6《多士第十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② 如孟子在回答战国时期卫国人北宫锜有关周王室爵位的问题时指出：“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章句下》，见（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2页。

“仕”，但统治部族内已有了层次的分化，上层的“士”别有大夫、卿、诸侯之称以示区别，同时“士”也有了上士、中士、下士之分；庶人中许多人无缘为官，只是受田的“农夫”；至于奴隶，既不能称“士”，也不能入学为官。于是，“士”可指称贵族的一个等级，这个等级的排列序列是王——侯——大夫——士，士的下面便是庶民和奴隶了。由此观之，士是指贵族的最低等级^①。刘泽华先生则指出，春秋以前的士，从社会地位看，它是一个等级；如果就其社会角色而言，他们的多数以充当武士为业；而从春秋中后期起，士作为一个等级已经逐渐解体，其后的战国时代士虽然仍具有等级上的意义，但这时的士基本上已从一个等级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其社会角色也逐渐由主要为武士转为主要为文士；这一时期的士也不是不从武，但军士主要由庶民充当了^②。在士由等级序列和由武士向文士的转变中，春秋战国之际无疑处于历史发展的关节点。这一时期，随着血缘宗法制的动摇，生产关系的变革，“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学的兴起，大量文士源源不断出现，士亦逐渐由贵族中的一个等级变为一个“有学”^③、“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④的社会阶层，士最初所具有的等级意义的痕迹愈益淡薄，而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⑤的指向愈加鲜明，由此，知识文化和以道为旨归的特征在士的身上凸显，士亦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讲过：“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⑥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士人社会角色的变化，士人阶层在社会舞台中日益活跃，其活动指向与范围也日趋广泛。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奔走游说，“自驸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驸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

①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文史知识》1989年第9期。

② 参见刘泽华《先秦时期的士》，《文史知识》1987年第12期。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即国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③ 《墨子·修身》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见《墨子》，李小龙译注，《中华经典藏书》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④ 《墨子·尚贤上》，李小龙译注，《中华经典藏书》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0页。

⑤ 《论语·述而第七》，见（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34页。

⑥ 载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5页。

事，以干世主”^①。他们深受当时统治者的青睐和尊敬，像“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②，这些享有一定爵位和俸禄的文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③。文士们大显身手，在社会政治、文化舞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像“自少好士”的晋文公，“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轾；魏武子”^④，这五位活跃在晋国政治舞台上的贤士，在辅佐晋文公成就晋国霸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政治的发展，特别是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为契机，文士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

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政治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直到宋代以前，广大的士人阶层并未真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

钱穆先生在史学论著《国史大纲》中，曾将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活动具体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⑤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74《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6页。

②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2《论儒第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9页。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95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56页。

⑤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1页。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活动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历史内涵的把握是正确的。以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兴起、诸子百家争鸣为契机,秦汉以下士人阶层的领导基础和文治政府的传统由此形成。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盛行,士族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活跃角色,为数众多的普通寒士实际被社会政治舞台边缘化。当时世家大族凭借其文化上的优势地位^①,不仅左右了社会上的文化风尚,而且垄断了社会上的主要政治资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②,士族文化和门阀政治由此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形态。隋唐时期,允许士人“怀牒自列于州、县”^③的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使士族门阀走上了不可遏制的衰落之路,但门阀势力的影响仍不可小觑,诸臣“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④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改观,此即为钱穆先生所阐释的“士族门第禅续不辍”,以至于发展为新的门阀贵族,亦即所谓“士的新贵族”。因此直到唐代,士人阶层仍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文官政治仍然没有确立起来。

以历史断代而言,唐宋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促成了宋代大量“白衣”士人阶层的崛起。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革,门阀政治的崩溃,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实施,士族门阀阶层已基本上从历史舞台销声匿迹。“其时社会已不再有门第,政府以考试取士,而进士皆出自白衣”^⑤。尽管当时士庶之间的差别仍客观存在,但随着大量“白

① 陈寅恪先生认为,“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特别是经过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家世与地域之两点,换言之,“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参见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22—23页。

② (唐)房玄龄、褚遂良等:《晋书》卷45《刘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74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1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1上《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9页。

⑤ 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载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9页。钱穆先生认为,进士出自白衣这一形势,直至清末,故其将宋自清朝定名为“白衣社会”。他指出:“白衣率从农村中崛起,其形势略同于汉武帝之时。所不同者,政府考试制度已大为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发明,书籍流布,较前远易。故两汉察举制度兴起以后有门第,而宋代士阶层复起,终不能再有门第形成。”同书第49—50页。

衣”士人阶层的崛起，士庶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在宋代国家的户籍结构中，只有“官户”和“民户”之分，而官无大小，品无高低，凡是入仕为官者，即使那些没有品级的低级官吏，也得称为官户。这说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使庶人阶层的队伍日益成长壮大，并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也正是从宋代开始，广大的士人阶层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入仕参政，从而真正成为一个融知识主体、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于一身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宋代社会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有专家学者将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看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家传统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①。宋人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中所说的“寒儒逢景运”一语，便是对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提高的形象注解。

总之，中国历史演进至宋代，随着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文人士大夫“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与此前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加之宋代重文轻武、“以儒立国”^②，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③，因而有宋一代士大夫表现出与此前士大夫阶层许多不同的精神特质，其心理认知、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精神风貌亦凸显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特质的变化，反过来又必然影响着时代的文化风貌，对宋代社会以及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鉴于以上认识，笔者拟在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进行宏观考察、探析。在此基础上，发掘、揭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主体意识及整体形象特征，并从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解读中揭示宋代士大夫多元化的人格特征，以期促进宋代士大夫群体研究与社会变迁的结合，深化对宋代士大夫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德国思想家马丁·路德曾这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和文明素养，即在于人

① 陈植锽：《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436《陈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40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70页。

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① 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士与官僚的结合体，作为一个拥有知识文化、思想信仰和以道为精神凭借的社会精英阶层，无疑是国家公民和文明素养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相较于宋前士大夫而言，由于宋代士大夫阶层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因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更能够影响和制约甚至主导着王朝社稷的前途和发展命运。因此，对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意识进行研究，无论是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抑或文化史的角度上讲，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把握宋代士大夫的整体形象特征，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认识，而且对于认识唐宋社会变革和宋代社会文化风貌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社会功能，以及知识分子现代价值的再创造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 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学术回顾

文人士大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仅就专著而言，刘泽华的著作《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及其主编的《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与《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王长华的《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王廷洽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葛荃的《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与《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于迎春的《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刘晓东的《明代士人生活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徐林的《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等，都是研究文人士大夫的专题力作。

有关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受到学界重视，

^① 转引自〔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研究成果颇丰。以下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略分几类予以介绍,以期能反映出宋代士大夫研究状况之大概,进而有利于今后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疏漏之处,敬请见谅。

1. 关于宋代士大夫阶层角色构成和社会地位的研究

受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影响,宋代士大夫的角色构成和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诸葛忆兵在《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①一文中指出,有宋一代士大夫阶层的构成成分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士大夫的出身由前代的以世家贵族为主转变为以寒族为主,大量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帝王治国方针下,通过科举取士成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主体力量,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宋代,由于帝王采取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以及对后妃、外戚、宦官、宗室四种政治势力的抑制,从而使士大夫的政治势力空前提高。陈峰先后发表有《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和《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②,前文认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地位的提高是与赵宋统治者在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所采取的“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紧密相连的。宋太祖在位期间,文官执政原则得以确立;太宗朝,“崇文抑武”方略得到深化,文臣地位进一步提高;之后的宋真宗,将延续下来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继续放大,宋代历史上文尊武卑的格局由此形成,文人士大夫已成为政治上的主体。后文重点就宋初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对士大夫文官阶层的选择展开了具体细致的论述,并对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以及宋政府在处理文武关系方面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经过宋初统治者的努力,到宋真宗朝,宋代终于完成了士大夫文官作为政治中坚力量的选择,从而确立了士大夫作为政治中坚的角色地位。王瑞来在《走向象征化的皇权》^③一文中,也对宋代士大夫官僚政治形态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论说,认为自宋朝始,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环境下,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势力空前成长;由于士大夫政治在官僚政治形态中已居于支配地位,从而让皇帝在政治舞台上由主角变成了配

① 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参见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③ 参见王瑞来《走向象征化的皇权》,载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角，皇权由此进入了象征化时期。张文浩在《宋儒的生存境遇与“包容政治”的蕴成》^①一文中指出，宋代以儒立国的文治政策，使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非其他朝代所能比拟，但宋初实行的以儒立国的文治政策，并不意味着赵宋统治者从此对文人士大夫的完全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士大夫屈尊于权势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对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在《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②一文中也有所论述，认为士大夫作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阶层，出现于科举制度确立的唐代，并在宋代取得了稳固的社会地位。他指出，与以前的统治阶级出身不同的宋代士大夫、士人层在积极地谋求自身的社会定位；经过唐宋变革，作为新兴的士大夫官僚登上了政治舞台，科举也作为士大夫官僚再生产机器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会中特别是地方社会内部的士大夫、士人层却未能确立与其应有的政治和思想地位相匹配的，并能够与之进行更稳定、更正确的整合的社会地位。

2. 有关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研究

宋代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使宋代士大夫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体，这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对于宋代士大夫在崇文政治环境下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学界却是见仁见智，评价颇不一致。江冰在《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③一文中指出，在重文轻武和科举制度改革的社会环境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虽然高于唐代文人，但其精神风貌却没有得到明显提高，从总体上看，宋代文人精神仍处于自盛唐以后“滑坡趋势”的低落状态之中。郑强胜《宋代吏风初探》^④一文认为，在宋代商品经济的冲击影响下，加之强大的皇权对官僚权力的剥夺，宋代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人生价值观有了改变，使吏风败坏，突出表现为官吏经商、贪赃枉法盛行，崇尚拜金和享乐，贪图奢华；而在右文政策影响下，文人士大夫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也表现出诸如“思想保守，不思进取”“意气用事，内讧太盛”“吏治凋敝，恶风盛行”等许

① 参见张文浩《宋儒的生存境遇与“包容政治”的蕴成》，《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

② 参见〔日〕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载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③ 参见江冰《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④ 参见郑强胜《宋代吏风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①一文，对10世纪前中期文臣群体的变化、演进脉络、能力素质以及唐末至宋初文武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论及北宋初年的文臣群体时，邓教授认为北宋初年以进士起家的执政文臣中的多数以郑重勤勉著称，都是赵宋开国后一系列“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但直到11世纪的前中期，具有明确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同时兼有才学识见能力和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体才从真正意义上形成。杨世利《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②一文，主要从儒家名节观在北宋遭遇的角度对北宋士风的演变进行了探析，认为士风的好坏与儒家名节观是否得到切实践行紧密相关。仁宗朝由于有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士大夫大力倡扬并身体力行儒家的名节观，所以士风较好；宋神宗为推行变法，儒家名节观遭到批判和否定，而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又受到儒家士大夫的批判和攻击，这样破坏了自仁宗朝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③一文在对中国古代士风、名节和气节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对宋朝士风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尽管北宋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倡扬儒家的名节、气节，但事实上儒家名节观的教育对宋代儒家士大夫所起的作用不大。张邦炜在《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④一文中，主要就学界在有关宋代士大夫评价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深入论说，指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虽然不能为多数士大夫所践行，但在宋代，范仲淹精神不仅为士大夫们普遍认同、称道，而且在当时起到了振作士气的作用，并由此将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精神视作有宋一代的时代精神。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⑤一文，认为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气质，不仅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一种重节义的道德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面貌，而且将其贯彻落实到日常的行为举止之中。王瑞来的《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

① 参见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参见杨世利《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中州学刊》2010年第2期。

③ 参见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④ 参见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

⑤ 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心的考察》^①一文,以范仲淹为中心,具体论述了宋代士大夫的报恩论、爱名论、忧患论、进言论、皇权论,对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给予了积极评价。刘兴亮《北宋士风之异动——以奔竞、隐逸、政争、奢靡等风气为例》^②,论述了在北宋特定政治环境下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奔竞、奢靡、隐逸、政争之风。他在《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③一文中,则从官场文化、士大夫政治心态、宋代选官制度、政治运行过程等角度对宋代士大夫表现出的奔竞之风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对宋代士习奔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的《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④一文,则就宋仁宗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的高昂向上的精神风貌及原因进行了论述。张海鸥《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⑤一文,从读书、为政、治学三个方面论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淑世情怀,认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狂热的淑世理想与狂直的进谏风尚”“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等高尚的人文精神。陈忻《两宋文人主体精神之比较》^⑥,结合两宋社会环境,分析比较了北宋、南宋文人的主体精神——北宋文人的旷达洒脱与南宋文人的坚毅执着。苗田、赵冬梅《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⑦一文,则分析论证了宋代士人那种不屈不移的高扬的人格精神特质。吕变庭在《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⑧一文中,主要从政治人格、文化人格、社会人格三个方面,对北宋士大夫所凸显出来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论析,认为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人格的突出特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了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意识。易小平在《试论北宋文人的 人格矛盾》^⑨一文中,主要对北宋文人士大夫“本我”和“超我”的人格矛盾以及公私分离的成因进行了论述。吴宁、范立舟《两宋士风述论》^⑩,

① 参见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载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参见刘兴亮《北宋士风之异动——以奔竞、隐逸、政争、奢靡等风气为例》,《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参见刘兴亮《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④ 参见刘兴亮《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

⑤ 参见张海鸥《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期。

⑥ 参见陈忻《两宋文人主体精神之比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⑦ 参见苗田、赵冬梅《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⑧ 参见吕变庭《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

⑨ 参见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 人格矛盾》,《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⑩ 参见吴宁、范立舟《两宋士风述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则对两宋士人所体现出来的“尚志节、重操守，成就光明俊伟人格的精神风貌”“贵隐逸、独善其身的士林风习”“明体达用，富而可求的功利主义风习”“奔竞、苟且、奢靡之士风”进行了综合性论述。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①一文，深入考察探析了北宋后期士大夫对内在精神天地关注的心态历程，以及北宋后期士大夫心态转向“内在”的原因。王晓如在《宋代重文轻武国策对士风的影响》^②一文中，重点论述了重文轻武国策对宋代士风所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认为宋代士大夫对富贵功名追求的价值观，以及或积极或消极的政治作为，与重文轻武国策有着密切关系。有的学者则主张宋代士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如毛元佑在《宋初文武臣僚处世态度之心理分析》^③一文中，通过对宋初二朝文武臣僚所体现的处世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分析，认为太祖一朝，文臣由五代时期的循默无为、苟全禄位变成勤于所职、锐意进取；太宗朝，官场上则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因循苟且，墨守成规。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④一文，认为对宋代士大夫风气与状态应该作阶段性变迁的考察，指出在长达160年的北宋时期，不同阶段表现出相互有别乃至迥异的士风。马茂军在《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⑤一文中，主要对北宋初到庆历时期的士风进行了论述，认为此时期的士风表现出由颓废走向激昂的演进过程。

有的学者从科举与士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王德毅的《宋代的科举与士风》^⑥，主要就宋代科举对士风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竞争激烈的科举使士习于奔竞，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但求虚名，不务实学，导致士风败坏；士风的败坏又使党争兴起，由此导致政风的恶化。李定广的《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⑦一文，认为宋代文人所表现出来的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与宋太宗以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举制度有关。屈超立《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⑧，主要就科举制度对宋代吏治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

① 参见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② 参见王晓如《宋代重文轻武国策对士风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③ 参见毛元佑《宋初文武臣僚处世态度之心理分析》，《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参见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⑤ 参见马茂军《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⑥ 参见王德毅《宋代的科举与士风》，《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⑦ 参见李定广《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

⑧ 参见屈超立《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齐鲁学刊》2003年第3期。